

# 社会福利的文化透视:观点与简评<sup>\*</sup>

毕 天 云

**Abstract:**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 or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welfare stud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pay their attentions to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al welfare.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s, and analyses five view-points briefly.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福利制度,但每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又不完全相同。在形成福利制度或福利模式差异的原因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变量。那么,文化是怎样影响或形塑社会福利的呢?近几年,从文化角度透视社会福利在国外研究社会政策的学术群体中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热门和前沿的学术研究领域,但国内的研究还相当欠缺。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把对社会福利进行文化透视的理论观点归纳为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论等5种,对每一种观点的基本主张进行了扼要介绍,并且对每一种观点的局限性和可取之处作了简要的评析。

## 一、文化起源论

“文化起源论”认为,以国家出面举办并承担主要责任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产生和形成的根源在于文化价值观,是社会文化“催生”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文化起源论”可以细分为“道德起源论”和“宗教起源论”。台湾学者林万亿认为,国家福利制度的“道德起源论”立基于假设普及的社会价值渗入社会行动,并且引导社会解决问题的正义方向;进而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道德正义的结果(1994: 78—79)。如美国学者伦宁格认为,早期德国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政策是为19世纪德国微弱的自由主义与坚强的“父权社会思想”和“基督教的社会伦理”所激发的。在美国方面,则因强烈的放任自由价值以及对个人主义与自助的承诺,导致对社会保险的顽强抵抗(转引自林万亿,1994: 79)。又如吉达佛德(Zijderveld)也以类似的观点来解释为何西、北欧的福利国家发展优于美国和日本。他认为,瑞典、荷兰等国家比较具有非道德的社会思潮,使其得以发展福利国家;相反,美国的新教伦理与日本的家源道德主义思潮则抑制了本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可能性(转引自林万亿,1994: 79)。此外,亚洲国家的学者也常常用此观点来解释该国的社会福利发展。例如印度学者常将印度的社会福利发展与甘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甘地的牺牲奉献精神启示了印度人民发展福利事业。林万亿认为,以国家的主流价值或大人物的道德高操作为社会福利发展的起源与范围的解释,无法精确地指出文化价值的影响力如何在政治冲突或政策争议中发挥,使得政策被制定以反映社会的主流价值与大人物的道德号召。而且,这种观点也无法解释在反福利的道德主义思潮里,仍然有一些社会福利方案被提出(林万亿,1994: 79—80)。美国学者米基利在分析国家福利的起源时提出“社会良心理论”(social conscience theory),认为国家(政府)建立和扩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动因在于“人道主义的推动力”(Migley, 1997: 98—99)。英国学者保尔·斯皮克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社会福利制度的道德起源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和经验论证(Spicer, 2000)。我国学者周弘在追寻西方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源时,对西方福利制度的道德起源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sup>\*</sup> 本文是根据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社会福利场域的习惯——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作的调整和修改。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导师景天魁研究员,感谢他对我的博士论文“画龙点睛”式的提示和3年中的悉心指导。

(1998: 28—34)。

“宗教起源论”认为,国家福利制度的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宗教是国家福利制度形成的重要根源。杨昌栋在其所著《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一书中,以五章的篇幅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社会福利发展中的重大贡献。他以非常具体的史料和事实证明:中古欧洲的基督教一方面直接为社会弱势群体(穷人、病人、远人、奴隶、农奴、妇女、婴孩等)提供各种福利;另一方面影响政府采取措施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济性福利以改善他们的艰难境况(杨昌栋,2000:1—132)。香港学者周永新在考察香港社会福利的发展时说:“香港社会福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到了今天,仍有众多教育、医疗和福利机构与天主教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回顾过去百多年社会服务的发展,教会团体应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1990:4)台湾学者万育维在分析社会福利的发展时指出:不论中、外社会福利的缘起都与宗教信仰有关,佛教的社会福利思想尤其是福田观念(旷陆义井、建造桥梁、平治险隘、孝养父母、恭敬三宝、给事病人、救济贫穷、设无遮会)与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古代不少社会福利事业就是按此列举而完成,导致社会福利事业及日后社会安全制度之实践”(1998:6—7)。英国学者米歇尔·拉斯汀指出:宗教是福利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宗教信仰不仅为教徒之间的相互帮助提供了观念基础,还为宗教组织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宗教不仅在前现代社会成为福利支持的重要支柱,还参与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建构,并在后现代社会里出现“复兴”的趋势(Michael Rustin ed., 1999: 257—260)。专攻宗教福利的台湾学者王顺民更是以一本20余万字的专著《宗教福利》对宗教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经验分析(1999)。

“文化起源论”(包括道德起源论和宗教起源论)看到了文化(道德和宗教)在社会福利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搭起了一座“因果桥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福利发展的客观事实。但是,在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国家福利制度的起源问题上,任何“单因论”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仅凭文化因素是难以完全解释国家福利制度的起源的。事实上,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福利制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文化因素外,还与国家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俾斯麦时期的社会保险制度),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所掌握的财力分不开。西方学者在分析西方“福利国家”的起源时,还提出了另外5种理论解释——“工业主义逻辑”、“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国家论”、“扩散模型与世界政体观”、“民主政治模型”和“国家中心论”(林万亿,1994)。此外,“文化起源论”主要回答的是“国家(政府)福利制度”的起源,而较少或没有回答“民间福利制度”的起源问题。事实上,由国家举办的“正式福利制度”是在民间的“非正式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万育维,1998:5—18),考察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首先必须回答社会福利制度的民间起源,然后才是国家福利制度的起源。

## 二、文化背景论

“文化背景论”认为,社会文化是“形塑”(shape)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变量,文化对于社会福利的作用和影响集中体现为社会文化构成社会福利制度的背景(environments 或 contexts)。持“文化背景论”观点的学者较多,这里仅能择其要者而述之。该种观点起源于英国社会行政学的鼻祖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他认为:社会政策(即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处于真空状态之中,它总是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研究别国的福利制度时,我们见到它所反映的该社会的主导文化和政治的特征”蒂特马斯(1991/1974)。后来,“文化背景论”的观点在由英国学者约翰·迪克逊(John Dixon)主持编辑的6本“比较社会福利系列丛书”中得以充分体现。这6本书以国家、地区为单位,分别介绍和分析了近50个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文化背景。在分析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时,作者把各国(地区)国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作为“形塑”其福利体系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1985年出版的《亚洲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in Asia*)一书中研究分析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等10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背景。约翰·迪克逊认为,中国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包括儒家的福利观念传统——强调依靠家庭而不是国家,无产阶级的工作伦理,平等主义和社会公正,勤奋、节约和简朴的美德,互助和集体精神,自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纳尔森·楚(Nelson Chow)认为,香港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背景是二元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习惯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是西方的观念,强调自我努力、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保尔·楚德瑞(D. Paul Chowdhry)指出,印度的社会福利价值观渗透着社会宗教系统、福利国家观念、职业主义和志愿主义。萨米亚(Takeshi Takahashi Yoshiko Someya)认为,影响日本福利体系的价值观包括“人民的生存权”观念,自助、家庭团结、初级群体、近邻和“忠诚于公司的工作伦理”。陈银俞认为韩国福利体系的思想背景包括人本主义——人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存在物,社区合作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和福利国家观念以及平等。苏哈马认为“形塑”马来西亚福利体系的价值观背景包括个人自主、政府的有限责任和私域(private sector)提供福利。番哥览泔(Evelina A. Pangalangan)认为影响菲律宾福利体系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框架(dominant value framework)包括合作精神、基督教、政府责任观念以及人权、社会公正和人民参与等人本主义思想。加亚苏里亚、浮南多和沃布濡克等人(Laksiri Jayasuriya, Gammuni Fernando & Malcolm Allbrook)认为斯里兰卡的福利体系由两个层次组成,政府举办的正式福利体系受到费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强调通过收入再分配达到社会公正和“普遍主义”的福利观念;由家庭、亲属网络、村庄和半城镇(semi-urban)组成的非正式福利体系深受佛教和印度教(Hinduism)的“布施”和“慈善”观念的影响。占厚生认为,台湾地区的福利体系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包括“父权主义”、“利他主义”和强调家庭作用;随着台湾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干预福利”的观念开始发挥作用。玉帕·汪差认为,泰国是一个佛教社会,泰国人的价值体系深受佛教影响,“给予他人”、“怜悯”、“仁慈”和“忍耐”的宗教观念深植于泰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中,因此,每个泰国人都会主动帮助家人和朋友,个人没有依靠政府的习惯,个人只有在无法从非正式网络中获得支持时才会不情愿地去寻求政府的帮助。尽管政府提供“最低基本需要”的福利观念开始引入,但其发挥的作用仍非常“薄弱”(John Dixon & Hyung Shik Kim, 1985)。

1987年出版的《非洲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in Africa*)一书中,研究者分析了埃塞俄比亚、加纳、象牙海岸、肯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10个国家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昆汀和埃米·露·森科(Quentin F. & Emmy Lou Schenk)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是处于“两个世界的人”(hyphenated Ethiopian),该国的福利体系既受自身的封建主义传统影响,又受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受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的制约。科普特教会认为,政府的福利项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可能会阻挠上帝的意志,所以,科普特教会机构在其所在地区为人们提供绝大多数的福利服务,如健康照顾、物质帮助、教育和食物分配。阿萨牟黑和诺逊(Yvonne Asamoah & D. N. A. Nortey)认为,加纳社会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是二元的,既有英国殖民地时期遗留的“普遍主义”传统又有本国的特色。本国特色的思想观念包括志愿主义和互助的家庭体系和精神、国家整合和文化多元化观念、自立和基本人权观念。亚当马·巴卡约克和塞维睡·埃黑曼(Adama Bakayoko & Sylvestre Ehouman)认为,构成象牙海岸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包括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两部分,前者体现为休戚相关的团结意识和兄弟友谊般的殷勤好客精神,它们保障了扩展的家庭体系、族群和村庄为其成员提供福利,后者体现为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实现社会平等。该塞嘎和威廉姆斯(Wacira Wa Gathaiga & Lorece P. Williams)认为,肯尼亚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既有前殖民地时期的福利传统又有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福利传统,主要表现为公有或集体精神、自立和部落价值观。毛黑普纳瑞·尤纳斯森(Mohipnarain Joynathsing)在分析毛里求斯福利体系的文化背景时,特别强调了该国劳动党的意识形态,劳动党的领导人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重要途径,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建立毛里求斯的福利体系。桑达(A. O. Sanda)认为,尼日利亚福利体系的文化背景

包括潜在的、未公开言明的价值观——共有倾向、重视家庭作用、尊重老人以及亲属间分享幸福和痛苦以及公开声明的价值观——公平、公正、人道、平等。麦肯德里克和杜达斯(Brian Mckendrick & Erzsébet Dudas)指出,在南非,普遍的观念是强调种族和文化差异以及族群的分离发展,影响南非福利体系和实践的三个关键性的思想原则包括憎恨社会主义、国家与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住宅、医疗服务和预防服务。莫尔亚和莫王堪耶(William J. Mallya & Haynes A. Mwankanye)认为,坦桑尼亚福利体系的观念背景包括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如互助,家庭、部族和村庄成员之间的相互保护和相互依靠)、集体工作、社会公平、自立、人人平等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草根发展”(grassroots development)。布如克斯和尼润达(Elizabeth E. Brooks & Vukani G. Nyirenda)认为,支撑赞比亚福利体系的文化背景是“以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信条以及社区主义的理念。哈玛普森和凯瑟克(Joe Hampson & Edwell Kaseke)分析津巴布韦福利体系文化背景时指出:该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公平,国家的领导者试图引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公平和平等的收入分配)作为建立福利体系的基本原则(John Dixon, 1987a)。

1987年出版的《中东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in Middle East*)一书中,研究者分析了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土耳其等5个国家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背景。卡瑟夫(A.S.M. Kashef)认为,埃及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背景包括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思想观念。前者体现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后者表现为社会成员普遍持有敬重老人、强调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紧密关系、子女服从父母等观念。这些思想价值观念背景使福利实践活动表现出两大特色:一是家庭是个人福利支持的主要来源,政府举办的正式的公共福利体系发展缓慢;二是老年福利比儿童福利和青年福利更为重要。戴维·马卡诺(David Macarov)认为,以色列的福利体系深受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二者都强调“帮助他人的道德承诺”,同时还受“公正社会”观念的影响。阿布拉哈马·W.阿塔(Abraham W. Ata)认为,影响约旦福利体系的主导价值观念有两条:一是病弱者和贫困者应该得到最低生活水平的保证;二是国家应该根据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把岁入(或税收)用于满足国民的基本需要,因此,社会福利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哈默德(Hassan R. Hammoud)认为,影响科威特福利体系的最重要的主导价值观念是伊斯兰教,其次是西方思想的传布——按照西方的观念和做法建立福利项目。埃米尔·戴尼索戈鲁(Emel Danisoglu)认为,影响土耳其福利体系的主导价值观念是“国家责任论”,国家承担人民福利供给任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免受自然、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的危害,从而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达到公正、公平和繁荣的目标(John Dixon, 1987b)。

1989年出版的《发达市场国家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in Developed Market Countries*)一书中,研究者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德、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等10个发达国家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背景。约翰·麦卡鲁(John McCallum)认为影响澳大利亚福利体系的主要思想观念既有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又有强调个人责任的节俭、自助、自立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贝莱米和埃尔文(Donald F. Bellamy & Allan Irving)认为加拿大福利体系的主导价值观念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依靠;二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沃尔夫冈·穆勒(C. Wolfgang Muller)认为西德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主要是包括了新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以及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具体体现为慈善、劳工教育、团结、国家辅助(先家庭、社区,后集体和国家支持)、代际契约(contract of generation)、教育权、人的尊严、自我帮助和“福利国家”意识。费雷拉(Maurizio Ferrera)认为在影响意大利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中,天主教的教义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强调社会和谐、阶级和群体合作以及宗教慈善,主张国家在福利提供上只能居于“辅助”地位,个人和初级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福利负有主要责任。这些思想阻止了“普遍主义”福利体系在意大利的发展。此外,社会主义的传统也有一定的但是“模糊”的影响。罗耶布里克(Joop M. Roebroek)认为支配荷兰社会福利发展历史的思想观念背景有两个:一是在宗教机构、民间组织和公共机构之间划分济贫的责任;二是公共的社会保障管理在“俾斯麦主义”和“贝弗里奇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划分”和“选择”的结果

是:教会机构和民间组织在济贫上占支配地位,国家仅仅起最后的“补缺”作用;社会保障管理策略形成了“两手在握”的灵活选择。斯戴芬·阿特利(Stephen Uttley)在分析新西兰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时说,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尽管新西兰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可以被视为一个“领头者”,但它的福利体系缺乏明确的思想观念支撑。但作者认为其实不然,影响新西兰福利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责任论”和“公民权利论”。佛桑德(Hildegunn M. Forsund)在分析挪威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时指出,挪威社会福利的发展受到“俾斯麦主义”和“贝弗里奇主义”的影响。在挪威,各种政治力量在福利观念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为国民提供各种福利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隐藏在“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人本主义的父权主义”(Humanitarian paternalism),正是这一价值观的存在使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力量。奥尔森(Sven E. Olsen)指出瑞典社会福利体系深深植根于团结一致和平等的价值观念背景中,政府在公民的福利支持上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力图建立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国家,宗教组织从属于世俗政权,在福利提供上作用很小。基恩·凯瑟雷(Jane Keithley)在分析现代英国福利体系的意识形态背景时,把它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福利体系深受“贝弗里奇原则”(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是国家的责任)的影响;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型”,在坚持国家责任的同时,强调家庭的“前线”功能和“混合的福利经济”。罗伯特·S. 玛戈尔(Robert S. Magill)在分析美国的福利体系时说:在美国的社会福利中,价值观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影响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中心价值观包括强调工作伦理和私人领域重要性的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强调“适者生存”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政策效用的实用主义,强调关怀“贫穷者”的人道主义。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自由和责任”,它导致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既不广泛也不慷慨(John Dixon & Robert P. Scheurell, 1989)。

在1990年出版的《拉丁美洲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in Latin America*)一书中,研究者介绍和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危地马拉、墨西哥、波多黎各、乌拉圭等9个国家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背景。揣加利(Irene Queiro Trajalli)认为阿根廷福利体系的本质受到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倾向的群体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各种移民组成的互助社团、有组织的劳工、政见不一的政党和军事组织。雷特(Celso Barroso Leite)认为巴西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包括罗马天主教会(提供社会服务)、缺乏社区意识、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以及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斯维亚·伯尔祖克(Silvia Borzutzky)认为影响当代智利福利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价值观念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念和政治权威主义。智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说:“创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集体主义哲学对人和存在着错误认识,以它为指导原则建立的福利体系归根到底反而无助于最贫穷者和弱势者”。皮雷斯(Roberto Arias Peres)在分析哥伦比亚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时指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意识形态是制约哥伦比亚福利体系的主要观念力量。麦萨—拉戈和罗卡(Carmelo Mesa-Lago and Sergio G. Roca)认为,古巴福利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包括集体主义、中央集权主义、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些观念使社会主义古巴的福利体系表现出覆盖面大、范围广、分配公正和相对平等特征。戈瑞斯·凯耶斯(Grace Keyes)认为影响“农耕社会”的危地马拉福利体系观念背景主要是天主教信仰,社会多元主义(Social Pluralism)——包括土著印第安人文化和拉地诺文化(本意指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混血儿或白人,作者在这里具体指混合了土著印地安文化和早期的西方文化即西班牙文化的混合文化),家庭、亲属群体和社区为个人提供福利的传统以及影响不大的强调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奥圭拉(Marian Angela Aguilar)认为墨西哥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包括社会公正和人权、自我恢复和生存的美德、相互帮助的集体精神、吃苦耐劳的勤奋精神、福利享受的阶级差异以及精英领导和决策的政治观念。瑟达(Raquel M. Seda)认为制约波多黎各福利体系的观念力量既是多元的又是相互矛盾的,包括罗马天主教传统、新教的工作伦理、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作伦理、平等、富足、通过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父权主义、中央集权制、竞争和科学的人本主义。塞尔代因(Rodolf Saldain)在分析乌拉圭福利体系的观念背景时强调三个因素:一是“保护国家”的观念——乌拉圭人期望国家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二是把社会福利看作降低社会不公平、

实现社会和政治控制的手段；三是体现中产阶级的福利观念(John Dixon & Robert P.Scheurell, 1990)。

在199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in Socialist Countries*)一书中,研究者分析了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鲜、波兰、前苏联等7个社会主义国家福利体系的思想观念背景。作者在分析这7个国家福利体系观念背景时,一方面指出他们的共性——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各自的个性。中国和古巴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其他5个国家的个性各有特色。捷克斯洛伐克福利体系的观念背景包括强调不分性别、民族的平等权利,重视老年、儿童和妇女福利,重视家庭在个人福利支持上的作用和功能。匈牙利的福利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平等、团结和工作三个价值观,但在实践中却发生了“变形”。凯姆(Hyung Shik Kim)认为朝鲜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影响该国福利体系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思想观念是“自主”(Juche, 朝鲜语)观念。“自主”观念是朝鲜各种政策包括福利政策的“根基”,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anthropocentric weltanschauung)、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和极权的专制主义。埃沃尔斯(Ewales)认为构成波兰社会福利体系的深层观念基础是社会公正、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人提高,表层的思想背景是“公民权利”和“国家责任”。维克托柔(Alecsandra Wiktorow)认为前苏联社会福利政策的总的观念基础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在此思想指导下建立由国家提供免费教育、医疗、低费住房、健康服务、社会保险等构成的社会福利体系(John Dixon & David Macarov, 1992)。

此外,英国学者阿瑟·高尔德在比较日本、英国与瑞典等国家的福利制度时,也把三个国家各自的“文化特性”作为塑造三国各自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他认为影响日本福利制度的“文化特质”主要有公平与平等、慈善父权与家庭主义、尊重权威、善意政府及善良管理和孝忠与顺从等观念。影响英国福利制度的“文化特质”包括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效用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个传统。影响瑞典福利制度的“文化特质”有务实的、意识形态的、具适应力的和有道德的观念(阿瑟·高尔德, 1997)。在国内,由杨光和温伯友主编的《当代西亚非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一书在分析该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出现的背景时,也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背景,认为该地区历史上存在的寻求社会公正、扶贫济困和互助的思想意识为引入和发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2001: 2—4)。杨光认为,以色列社会保障制度的文化传统背景包括提倡慈善、施舍和互助合作精神的犹太教信仰、寻求社会公正的思想、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杨光、温伯友主编, 2001: 29—30)。唐宝才认为,沙特阿拉伯社会保障制度的文化背景主要是伊斯兰教的训诫:照顾穷人利益、提倡赈济灾民、照顾孤寡老幼,劝人行善、禁止和惩罚邪恶,以及互相帮助和乐善好施(杨光、温伯友主编, 2001: 71)。王凤认为,几乎是全民(99%)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其社会保障制度深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伊斯兰教所蕴涵的社会福利思想(正义、济贫、施舍、善待孤儿、公平、公正、行善等)以及有关的慈善活动,是土耳其社会福利事业重要的文化环境(杨光、温伯友主编, 2001: 115—116)。张文贞认为,埃及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自古就有扶贫济弱、敬老养老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观念与伊斯兰教的福利思想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文化背景(杨光、温伯友主编, 2001: 148—149)。张宝增在分析南非社会福利制度的文化背景时指出,构成旧南非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原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二是支持国家与社团组织之间的合作;三是提供福利服务的方式从以家庭服务和治疗性的服务为主转变为以社区服务和预防性服务为主。1994年新南非建立以后,民族和种族平等、民主和人权、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等新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承认,并已成为政府制定和推行新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指导思想(杨光、温伯友主编, 2001: 166—167)。

上述提到的文献都不是专门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福利的,文化分析仅是其中极少的部分。笔者认为,“文化背景论”的最大功绩在于指出社会福利研究中被“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操作主义”所忽视的文化因素,看到文化是影响福利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的因素或变量。其次,“文化背景论”对构成背景的各种文化要素(思想价值观)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这有利于人们从经验的角度识别是哪些文化因

素在起作用。从他们所介绍的近 50 个国家的情况看,在影响各国福利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念中,既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又各有千秋。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很少受或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体系与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社会主义国家有显著区别;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国家又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背景论”对社会文化和社会福利之间的互动机制作了“环境—中心”的理论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已经触及或者蕴涵着“嵌入论”(embedment theory)的观点,即任何一个社会的福利制度都并非是“文化悬置”的,相反,它是“嵌入”到该社会的文化环境之中的;只有深入到不同社会的文化脉络中,才能真正地“解读”和“把握”福利制度模式的差异。但是,“文化背景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外生化倾向”。它把文化仅仅看成是福利体系的一种“背景”或“环境”,这样,文化仅仅是福利体系的一种“外生变量”,它只是从社会福利体系的外部发挥作用。其实,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文化是人的血液”(德国 18 世纪著名思想家赫尔德语),它一定会渗透在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并时时发挥作用。二是“平面化倾向”。上述提到的文献在分析各国(或地区)福利体系的文化背景时,只是列举出影响福利体系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念,并没有对这些思想价值观念进行层次划分。事实上,影响福利体系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念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层次的思想价值观念对福利体系和福利实践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的处于深层,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对人类的各种福利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有的处于中间层,仅对某一类福利活动发挥作用;有的处于表层,仅仅对一些具体的福利活动有作用。因此,对于“文化背景论”,我们在承认其基本贡献的同时,还必须对它进行“内生化和“层次化”的改造。

### 三、文化传播论

文化传播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异域文化”(他国文化和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从文化角度探究社会福利的学者大都持有这种观点,约翰·迪克逊主持编辑的 6 本“比较社会福利系列丛书”,在分析曾经有过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时,都指出其福利体系深受“宗主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又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深受前苏联福利制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全盘苏化”。台湾学者万育维在分析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时指出:台湾“社会福利的发展亦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今天仍有众多教育、医疗和福利机构与天主教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回顾过去百多年社会服务的发展,教会团体应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传教士曾接受高深教育,因而带来新观念,遂在台湾建立了新制度和服务,例如学校、医院和许多早期的收容教养机构”(1998: 7)。又如全菲认为西方思想的传播是推动海湾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主要力量,“社会保障的许多方面实际在阿拉伯各国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各国许多社会慈善机构和社会条款的诸多规定,都是依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发展的”(2001: 85)。田毅鹏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入侵,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上出现了研究并试图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次高潮(2001)。“文化传播论”看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他文化”影响的事实,这在总体上也属于探讨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关系的范围,它提醒我们在全球化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时,既要重视“异域文化”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又要保持“文化自觉”的心态。由于“文化传播论”对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一种“异域文化”—“本土福利制度”的“嫁接论”的逻辑,所以,它既没有解决“异域文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没有这个过程,异域文化只能处于一种“圈内的局外人”地位),也没有回答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本土文化”是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福利制度的,而这正是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福利的主要课题。



## 四、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认为,当今世界上社会福利制度的模式或体制是多种多样的,决定不同福利模式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差异,而是文化因素的不同。根据对“文化”一词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文化决定论”可细分为三种类型。

1. 整体文化决定论。整体文化决定论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整体模式之所以不同,归根到底是由其“整体文化”(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各种具体文化的总和)决定的。“整体文化决定论”的代表应该首推英国杰出的社会政策分析专家罗伯特·平克(Robert Pinker),他在研究英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时说:“社会心理学的现象,可以协助来解释英国和日本之间一些社会福利义务和受益资格明显的差异”(阿瑟·高尔德,1997);“如果审阅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福利项目各自的范围,并且探索两者之间与文化因素的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未必可以用来揭示两个社会的相似之处”(转引自黄黎若莲,1995:16)。平克的香港弟子黄黎若莲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得出“结构和文化因素对福利模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结论(1995:228)。大陆学者王继在研究香港的社会保障模式后认为,“香港社会保障计划的制定,是从香港市民的价值观念出发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为主体的香港文化,决定了香港社会保障的目标是鼓励个人自强、自立而不盲目依赖社会保障”(1999a、1999b)。

2. 单项文化决定论。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实际上都是包罗万象的,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福利制度都包括多个福利项目,是多元福利项目的有机整合或组合。因此,“整体文化决定论”的视野尽管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的优点,但同时也难以避免“笼统化”、“模糊化”的弊端。事实上,就文化决定论而言,从理论上可有4种组合结果:A.整体文化决定福利制度的整体模式;B.单项文化决定福利制度的整体模式;C.整体文化决定福利制度中的单项模式;D.单项文化决定福利制度中的单项模式。在这4种组合中,组合A的观点如上所述,组合B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组合C的研究文献较少,组合D的研究成果相对多一些。如关于东、西养老模式差异的文化诠释之研究就比较多(Lin Ka, 1999;林义,2000;丁文、蒋海益,2000;赵小妹,2001)。在4种组合中,A和D两种观点对于文化决定论的分析更具理论上的合理性,特别是组合D比组合A更具经验的操作性,更易于进行具体、深入的操作化研究。在实际的学术探讨中,越来越多持文化视角的福利研究者开始放弃“大而全”的思路,转向“小而精”的理路。

3. 意识形态决定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比较社会福利的西方学者运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方法,概括和分析当今世界存在的各种福利模式,使社会福利模式成为比较社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sup>①</sup>与此同时,在持文化视角研究比较社会政策(或比较社会福利)的西方学者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学术波浪”——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不同社会福利模式的基本标准。该种观点认为,每一种社会福利制度背后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福利模式。

(1)蒂特马斯的社会福利模型说。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是社会福利研究中较早进行福利模式划分的学者,他非常强调社会福利研究中的“价值有涉”,认为:“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蒂特马斯,1991/1974:122),因此,“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蒂特马斯,1991/1974:15)。1974年,蒂特马斯在其名著《社会政策十讲》一书中根据社会政策与手段的主要差异——价值系列里的终结点的不同,把社会福利制度分为三个模型。A模型——剩

<sup>①</sup> 丹麦社会学家皮特·阿布拉哈姆森甚至把西方福利制度类型学研究的繁荣景象比喻为“福利造型业”(Abrahamson 1999:394-415)。



余福利模型(the residual welfare model)。该模型的意识形态认为:私有市场和家庭是两个福利供给的“自然的”渠道,个人的需要可以通过它们而获得适当的满足;只有当它们崩溃的时候,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设施才介入运作,并且应该只是暂时的。因此,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其规模越小越好;而人民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则越大越好。至于社会政策,只应担当剩余的角色,最好能以志愿方式推行;要在最大范围内让个人凭良心办事,让他们像在私营市场内那样自由运用自己的金钱;不要让“不知什么才是最好的”大小官僚来干扰他们。

B 模型——工业成就模型(the 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 model)。该模型的意识形态认为:国家举办的社会福利设施只充当经济的附属品,福利的获得应该论功行赏,按照各人的优点、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来满足其需要。因此,这种福利模型也被称为“婢女模型”(Handmaiden Model)。

C 模型——制度性再分配模型(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 model)。该模型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的主要统合制度,它在市场之外,按照需要的原则,提供普及性的服务(蒂特马斯,1991/1974:17—19)。蒂特马斯增加 B 模型主要是用来指代德国和前苏联的福利制度。其实,他的 A 模型和 B 模型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类似威伦斯基和莱博豪斯的“补缺型福利”,而 C 模型则类似“制度型福利”。后来,蒂特马斯本人也直接使用补缺型福利制度和制度型福利制度这两个概念。

(2)邱里尔的社会福利模式说。1979年,英国的社会福利研究者帕克·邱里尔(Park Julia)在《社会政策与公民权》(*Social Policy and Citizenship*)一书中把社会福利制度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放任主义的社会福利(laissez-faire welfare)。该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别强调个人自由选择的价值和市场机制的运作,重视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它认为社会福利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根据个人在经济生产中所占的位置来决定的,即拥有生产工具或劳动能力强的人所分享到的资源应该比那些不拥有生产工具或劳动能力低下的人多,政府只有当个人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才介入以提供社会福利。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socialist welfare)。该模式的意识形态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共享的权益和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权利与自由;但个人的自由不是放任主义模式所强调的“与生俱来的自由”(freedom from),而是“参与的自由”(freedom to)。基于这一价值理念,政府的角色乃在于提供一个环境,该环境允许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不论其才智或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都共同拥有选择的自由。在社会福利的供给方面,政府的功能在于提供各种福利服务,个人享受社会福利服务的标准不是个人是否有支付福利服务的能力,而是个人的福利需求,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福利资源的原则受到排斥。三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liberal welfare)。该模式的意识形态介于放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它一方面强调个人具有选择的自由和机会,注重市场机制在分配资源上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又强调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兜底”作用:依照社会大多数人的相对生活水平来确定个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当个人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时,政府必须为他们提供必不可少的福利支持(林万亿,1995:4)。

(3)乔治和韦尔定的社会福利模式说。1985年,英国的社会福利研究者乔治(Victor George)和韦尔定(Paul Wilding)在他们合著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一书中,根据影响社会福利发展的4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把社会福利制度分为4种模式。一是反集体主义的福利模式(anti-collectivists)。该模式的社会意识形态强调自由、个人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人有选择的最大自由。而社会福利服务的供给,必须依靠个人选择的自由,政府的功能在于确保个人的自由,任何不当的政府干预都可能扭曲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二是半集体主义的福利模式(reluctant-collectivist)。该模式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反集体主义的福利模式十分相似,也是强调个人自由和不平等。但这个模式坚信如果要达到个人自由的目标,资本主义的市场分配必须透过规范和控制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功能。政府在提供福利服务上所扮演的角色仅仅限于十分有限的福利服务。该模式认为自由市场体系的运作就可以满足个人的福利需求,政府若是过度干预可能会威胁到个人选择的自由。三是费边社会主义的福利模式(Fabian Socialist)。该模式所追求的社会价值是:平等、自由、友爱和民主等。这种福利模式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导致缺乏效率,同时也违背社会正义的原则。费边社会主义不仅主张机会平等,更强调达到目的之手段的平等。因此,在社会福利方面,政府的角色在于提供各种福利服务,而个人则依

不同的需求“各取所需”。该模式也认为政府干预市场机制提供福利资源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点,进而通过社会福利以达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福利模式(Marxist)。该模式的核心理念与费边社会主义的福利模式十分相似,都是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但这种模式的社会福利尤其强调为了达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的角色乃在于提供各种福利服务,使社会福利的供给能够满足各种不同福利的需求。其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来供应所有的福利资源,所有的生产资源也由政府来统筹经营(George Victor & Paul Wilding, 1985)。

(4)安德森的福利体制说。1990年,瑞典的社会政策专家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在其引起轰动的名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中,以福利提供的去商品化程度(de-commodification)、社会阶层化状况(social stratification),以及国家、市场和家庭在福利提供中的不同角色安排为标准,把当代主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福利体制。安德森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属于自由型福利国家体制的“原型”,该福利体制具有以下特征:①以资产调查式的救助、有限的普遍性转移或有限的社会保险规则为主导;福利给付主要是迎合低收入、依赖国家的案主人群的需要(主要指劳工阶级)。②社会改革的进步严格受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限制,它们有将社会福利限制到十分边缘的倾向,避免通过选择福利来替代工作;领取福利的资格规定相当苛刻,并且时常伴随着“烙印”效果;给付通常是有限的。③国家要么消极地只保证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准,要么积极地通过补贴私人福利的方案来鼓励市场机制。④在该福利体制下,几乎没有福利提供的去商品化,国家有效地控制社会权的范围,并建立一个阶层化的社会秩序,在其中,接受国家福利的人具有相当类似的贫穷程度,其他多数人则有市场差别待遇的福利水准。第二种是保守-组合主义的福利体制。安德森认为,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属于保守-组合型的福利国家体制,该模式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①福利提供的去商品化程度属于中等水平,社会福利是公民权一部分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但传统的权威结构和合作主义的安排对这种公民权有很大影响。②宗教的和传统的关于家庭和性别分工的信仰还占有统治地位,教会和志愿组织在社会福利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尽管国家已经做好取代市场成为福利供应者的准备,私人保险和职业上的附加给付扮演相当边缘的角色,但是,国家政府仍然强调维持既有的地位差异,不太注重再分配的效果。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安德森认为,北欧诸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型态,该模式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①该体制是通过将普遍主义原则与去商品化的社会权扩展到新中产阶级的国家中组成的,在国家与市场之间,以及劳工与中产阶级之间不存在二分情形;他们追求促进最大程度的平等,福利服务的给付水准提升到与新中产阶级最独具的喜好相同的程度,劳工阶级也能完全享有境况较佳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品质,以实现完备的平等。②该体制融合福利与工作,立即而且毫不犹豫地提出充分就业的保证;工作的权利与所得保障的权利之间有相同的地位,社会问题减到最小,国家税收扩到最大,以减少依赖社会转移支付为生的人数。③该模式排挤了市场机制,所有的人都有好处,所有的人都是依赖者,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有责任去支付代价。④该模式的政策强调解除对市场与传统家庭的限制。它与保守-组合主义模式不同,不是等到家庭能力已经耗尽之后才给予帮助,而是先发制人地将家庭关系的成本社会化,其理想不是把对家庭的依赖扩到最大,而是去扩展个人独立的能力。非常明显,在安德森看来,这三种福利体制不仅是并列的,而且是分等级的;对安德森来说,理想的福利模式当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即他“家乡”的福利制度(埃斯平·安德森,1999:45-48)。

“文化决定论”(无论哪种形式)在社会文化和社会福利模式之间建立了一种“决定论”的逻辑,与“经济决定论”相比,它在解释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模式的差异时是很有说服力的。<sup>①</sup>当然,文化决定

① 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一个研究社会福利模式的学者从经济角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程度)来划分福利模式,也很少见到有学者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划分福利模式。米什拉(Ramesh Mishra)曾经在1981年再版的*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Welfare*一书中作过尝试,但最后还是回到文化上,这说明从文化的角度划分福利模式的做法确有一定的道理(Ramesh Mishra, 1981)。

论只有在特定的意义上才有其合理性,它还有几个问题不能解决:第一,“文化决定论”要完全成立,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建立了不同的福利制度,那么,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基本上或只能是文化因素了;然而问题是,在现实中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的。正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现实中也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第二,“文化决定论”把不同的国家纳入同一个福利模式,忽视了文化的国家差异。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文化是完全相同的,就拿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血缘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来说,他们各自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两国的福利体系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三,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文化决定论”也还存在一个问题:它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前提假设即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这种前提条件,“文化多元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文化决定论”中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主流文化”和“官方文化”,并不包括各种“亚文化”和“民间文化”,在福利活动中,不仅仅是“大传统”(主流文化)起作用,“小传统”(亚文化)也起作用。总体而言,笔者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来划分社会福利模式,但是,要使这一理路更具有说服力,必须进一步使其精细化。

## 五、福利文化论

“福利文化论”认为,不同社会(国家)之间的福利制度和福利模式差异是由他们各自的福利文化所决定的。福利文化论的代表首推英国的罗伯特·平克,他是最早提出和使用“福利文化”(welfare culture)概念的学者,是福利文化论的真正“鼻祖”。据黄黎若莲说:“1986年,平克发表了题为《日本和英国的社会福利的比较研究——社会福利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内容》的论文。文中提出‘福利文化’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福利文化分成两个部分:价值观,它影响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行为习惯,价值观通过它找到了在实践中的表现方式。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福利文化,一方面是以正式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见于家庭、朋友和邻居间的非正式的互助。价值观主要影响制定社会政策的决定选择,而制度安排则受到国家特色的影响”(黄黎若莲,1995:16)。今天回过头来看,尽管平克只是“提出问题”没有“解决问题”,但他仍然不愧是一个具有“理论敏感性”和“学术前瞻性”的学者。在平克提出“福利文化”概念13年后,他的思想启蒙终于在英国后继的社会福利研究者中结出了新的“智慧之果”——“福利文化范式论”。1999年,由4位英国学者凯姆贝莱恩、库珀、弗里德曼和迈克尔·拉斯汀(Prue Chamberlayne, Andrew Cooper, Richard Freeman & Michael Rustin)共同编辑的《欧洲的福利与文化:走向社会政策的一个新范式》在英国出版。这是一部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福利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不仅有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也有具体的实证研究成果;不仅提出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问题,而且提出了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的新范式——福利文化范式,提出文化不仅是福利的一个内在的、本质的方面,而且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该书认为福利文化研究是“从根子上”(from the bottom up)揭示了社会福利体制的差异;同时提出了研究社会福利文化的具体方法——比较研究、定性分析、微观水平、个人传记与主观经验、描述性和反思性。总之,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福利研究中质性的、微观水平的社会学著作,也是一种“福利人类学”研究(Prue Chamberlayne, et al., 1999)。1999年,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的林卡(Lin Ka)出版了《儒家福利簇:社会福利的文化解释》(Confucian Welfare Cluster: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Welfare)一书,该书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把社会福利制度置于特定的文化脉络中,不仅深入分析了中国大陆、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社会福利制度的个性,同时还把它们作为一个“儒家福利簇”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对比。此外,林卡还从社会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福利体制划分的新理论——福利簇理论(welfare clusters)。虽然该书没有直截了当地以福利文化作为整体的“概念框架”,但该书的内容基本上属于福利文化研究的范围。

“福利文化论”与前面的“文化决定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从“文化决

定论”中发展出来的。当然,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前者是“文化决定论”,后者是“福利文化决定论”,二者之间的差异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区别。笔者认为,尽管“福利文化论”中的“福利文化”概念还存在缺陷,使用它时还不能奉行直接的“拿来主义”,必须修正和重新定义,但“福利文化论”的思想和方法在分析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解释社会文化对于社会福利的作用机制上比前4种观点更具深度,更切中问题的要害。因为,“福利文化论”克服了前4种观点的根本缺陷——机械论的“外生化倾向”。无论是“文化起源论”还是“文化背景论”,无论是“文化传播论”还是“文化决定论”,尽管它们解释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互动机制的角度不同,强调社会文化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的程度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也即共同的致命弱点——机械论的“外生化倾向”:它们在实质上都是把“社会文化”和“社会福利”看成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不管用“起源”还是“背景”,或者是“传播”和“决定”,都避免不了视“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为“我的大脑”与“你的身体”的关系,而不是“我的大脑”和“我的身体”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把社会文化看成社会福利体系的“外生变量”,文化仅仅从外部作用于社会福利。与此相反,“福利文化论”不再“打外围战”,而是直接“切入心脏”;它不是泛泛而谈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而是把文化与社会福利有机地结合起来,文化不再是脱离社会福利的文化,而是福利文化。这样,文化就成了人类福利实践活动中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社会文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就回到了“我的大脑”与“我的身体”的“本原”关系上,文化(福利文化)就成为福利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福利文化的提法较好地揭示了社会文化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福利的内在机制,相对于前面几种观点而言,“福利文化论”是目前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福利较为合理的理论视角和概念工具。<sup>①</sup>

当然,由于福利文化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尽管已经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这需要专文论述),但还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什么是福利文化?它与非福利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区别?福利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或成分?这些内容之间是什么样的结构?研究福利文化的基本框架是什么?研究福利文化的方法有哪些?福利文化是怎样影响福利制度的?福利文化的差异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制约或决定福利模式的差异?福利文化的差异如何影响福利场域中的各种行动者……都需后续的研究来解答。

#### 参考文献:

- 阿瑟·高尔德,1997.《资本主义福利体系:日本、英国与瑞典之比较》,吴明儒、赖雨阳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 埃斯平·安德森,1999.《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古允文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 陈国康,1998.《香港的社会福利观》,王思斌等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中华书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 蒂特马斯,1991/1974.《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 丁文、蒋海益,2000.《中西家庭供养保障的跨文化考察》,《家庭与社会保障》(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黎若莲,1995.《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民政福利研究》,唐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康子,1998.《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沈洁、赵军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辉,2001.《论建立现代养老体系与弘扬传统养老文化》,《人口学刊》第1期。
- 李若建,2000.《老人对子女的依靠心态与养老模式选择》,《社会科学》第8期。
- 林万亿,1994.《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 ,1995.《论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福利观》,林万亿等:《台湾的社会福利:民间观点》,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林义,1997.《社会保险理论的新视角:兼论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意义》,《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00.《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的制度文化根源初探》,《财经科学》第4期。
- 吕宝静,1995.《民意与社会福利》,林万亿等:《台湾的社会福利:民间观点》,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罗尼辛·M.约翰,1990.《社会福利观念的变迁》,辛炳尧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sup>①</sup> 当然,本人并非盲目崇拜“福利文化论”。如果认为不同社会的福利模式差异完全是由福利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这仍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仍然没有跳出“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同时,承认“福利文化论”更具合理性并非意味着前面4种观点没有价值。

- 麦可·苏利文, 1989《社会学与社会福利》, 古允文译,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诺埃尔·蒂姆斯、丽塔·蒂姆斯, 1989《社会福利学词典》, 岳西宽等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尚晓援, 2001a,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 2001b, 《从国家福利到多元福利》,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 田毅鹏, 1999《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 吉林大学出版社。
- , 2001, 《西学东进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 万育维, 1998《社会福利服务: 理论与实践》,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汪雁、慈勤英, 2001,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人口学刊》第5期。
- 王方, 2001, 《台湾民众社会福利态度之决定因素初探》, 《东吴社会学报》第11期。
- 王继, 1999a, 《香港社会保障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社会》第5期。
- , 1999b, 《试论香港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客观基础》, 《复旦学报》第5期。
- 王顺民, 1999《宗教福利》, 亚太图书出版社。
- 王思斌, 2001, 《中国社会的求一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王思斌等主编, 1998, 《中国社会福利》,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 威伦斯基, 1982《福利国家与平等》, 卫民译, 台湾国立编译馆。
- 杨昌栋, 2000《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光、温伯友主编, 2001, 《当代西非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 法律出版社。
- 杨孝濂, 1980《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詹火生, 1988《社会福利理论研究》,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 张世雄, 1996《社会福利的理念与社会安全制度》, 唐山出版社。
- 赵小妹, 2001, 《中英文化差异在养老问题上的体现》, 《江海学刊》第2期。
- 周弘, 1998《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 上海远东出版社。
- , 2001a, 《福利国家何处去》,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 2001b, 《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框架》, 《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周永新, 1990《社会福利的观念和制度》,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 , 1993《社会福利12讲》,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Altman, Morris 2001, “Culture, Human Agency, and Economic Theory: Culture as A Deteminant of Material Welfare.”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Sept-Oct, v. 30n. 5.
- Alcock, Pete & Gary Craig 2001,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y: Welfare Regime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 Araki, Hiroshi 2000, “Ideas and Welfare: The Conser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Regim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 29n. 4.
- Baldock, John 1999, “Culture: The Missing Variable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 33n. 4.
- Bary, Norman 1999, *Welfa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verly, David P. 1987,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Justice*, Prentice-Hall, Inc.
- Burdon, Tom 1998,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A Clear Guide*, Pluto Press.
- Chamberlayne, Prue Andrew Cooper, Richard Freeman & Michael Rustin 1999, *Welfare and Culture in Europe: Toward a New Paradigm in Social Policy*,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 Ltd.
- Colby, Ira Christopher 1989, *Social Welfare Policy: Perspectives, Patterns, and Insights*, R. R. Donnelley & Sons Company.
- Deacon, Alan & Kirk Mann 1999, “Agency, Modernity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 28n. 3.
- Dean, Hatley & Zafar Khan 1997, “Muslim Perspectives on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 26n. 2.
- Dixon, John & David Macarov 1992, *Social Welfare in Socialist Countries*, Routledge.
- Dixon, John & Hyung Shik Kim 1985, *Social Welfare in Asia*, Croom Helm Ltd.
- Dixon, John & Robert P. Scheurell 1989, *Social Welfare in Developed Market Countries*, Routledge.
- 1990, *Social Welfare in Latin America*, Routledge.
- Dixon, John 1987a, *Social Welfare in Africa*, Croom Helm Ltd.
- 1987b, *Social Welfare in the Middle East*, Croom Helm Ltd.
- Ferge, Zsuzsa 1997, “The Changed Welfare Paradigm: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 31n. 1.

- Fitzpatrick, Tony 2001. *Welfar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algrave.
- Gordon, Scott 1980. *Welfare, Justice, and Freedo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odman, Roger, Gordon White & Huck-ju kwon 1998.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Routledge.
- Hewitt, Mutin 2000. *Welfare and Human Nature: The Human Subject in Twentieth-Century Social Policies*, Macmillan Press Ltd.
- Hill, Michael 1996. *Social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 Kangas Olli 2000.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Social Policy: Some Reflections on Rawl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 34n. 5.
- King, Annette & Prue Chamberlayne 1996, "Comparing the Informal Sphere: Public and Private Relations of Welfare in East and West German." *Sociology*, Nov. v. 30n. 4.
- Ku, Yeur-wen 1997, *Welfare Capitalism in Taiwan: Stat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cy*, Macmillan Press.
- Lin, Ka 1999, *Confucian Welfare Cluster: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Welfare*, University of Tampere.
- 2001,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Scandinavian Social Policy Model."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 35n. 3.
- Midgley, James 1997, *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 SAGE Publications, Inc.
- Mishra, Ramesh 1981, *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The Macmillan Press.
- Nam, Richard C. & Joe C. B. Leung 1995. *Authority and Benevolence: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Neil, Gilbert 1995, *Welfare Justice: Restoring Social Equ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eter Abrahamson 1999, "The Welfare Modeling Business."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 33, No. 4
- Pierson, Christopher & Francis G. Castles 2000. *The Welfare State: A Reader*, Polity Press.
- Pinto Rogenio M. 2002. "Social Work Values, Welfare Reform, and Immigrant Citizenship Conflicts (Glob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Jan-Feb, v. 83n. 1.
- Rustin, Michael (ed.) 1999. *Welfare and Culture in Europe: toward a New Paradigm in Social Policy*,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 Ltd.
- Spicker, Paul 1993,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Routledge.
- 2000. *The Welfare State: A General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Ltd.
- Stone, Thomas 1997,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Welfare Entitlements: A Note on Change and Adapt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May-June, v. 26n. 2.
- Victor, George & Paul Wilding 1985. *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 Williams, Fiona 1999, "Good-enough Principles for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 28n. 4.
- Williams, Fiona, Jennie Popay & Ann Oakley 1999. *Welfare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UCL Press.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志敏